

中国美术史

王朝闻 邓福星 总主编

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美术史

王朝闻 邓福星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史.第6卷.宋代.上/王朝闻主编.—2版—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303-11355-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美术史—中国—宋代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00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210 mm × 285 mm
印张: 26.5
字数: 58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5.00 元

策划编辑: 李 强 陶 虹 责任编辑: 李 强
美术编辑: 李 强 装帧设计: 天泽润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中国美术史

总主编 王朝闻

副总主编 邓福星

宋代卷(上)

主编 徐书城 徐建融

总 主 编 王朝闻

副总主编 邓福星

主 编 徐书城 徐建融

编 委 王朝闻 李 松 杜哲森 徐建融 徐书城 陈绶祥
单国强 杨 新 邓福星 刘兴珍 薛永年 顾 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辑部主任 刘兴珍

撰 稿 王振德 王连起 徐建融 徐书城 高铭潞 陈传席
梁济海
(以姓氏笔画为序)

插 图 徐建融 刘兴珍

资 料 李黎阳 朱京生

总 目

正文目录	(I—IV)
正 文	(1—406)
参考书目	(407—413)
后 记	(414)

正文目录

导 言	1
第一节 五代、两宋美术风格的转捩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3
第二节 五代、两宋美术风格转捩的特色	8
第一章 画院内外	17
第一节 宫廷画院	19
一 五代画院	
二 北宋画院	
三 南宋画院	
四 辽、金的宫廷绘画	
第二节 文人画和禅画	39
一 文人画	
二 禅画	
第三节 院墙内外的交流	45
一 画院内部及其与院外职业画家间的交流竞争	
二 画院与文人、禅僧画家间的交流竞争	
三 院墙内外交流的成果	

第二章 人物画.....49

第一节 概述 51

第二节 五代的人物画 54

一 贯休、石恪与西蜀人物画

二 顾闳中、周文矩与南唐人物画

三 其他画家

第三节 北宋前期的人物画 68

一 高益、高文进与相国寺画壁

二 武宗元与玉清昭应宫画壁

三 其他画家

第四节 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的人物画 84

一 李公麟与士夫生活画

二 风俗画

三 历史画

四 马和之与《诗经图》

第五节 南宋后期的人物画 120

一 梁楷和法常

二 其他画家

第六节 辽、金的人物画 135

一 辽的人物画

二 金的人物画

第三章 山水画..... 139

第一节 概述 141

第二节 五代的水画 146

一 荆浩、关仝与北方山水画

二 董源、巨然与江南山水画

三 其他画家

第三节 北宋前期的山水画 166

一 李成及其传派

二 范宽及其传派

三 其他画家

第四节 北宋后期的山水画 188

一 郭熙和王诜	
二 赵令穰	
三 米芾、米友仁与墨戏云山	
四 其他画家	
第五节 南宋的山水画	219
一 赵伯驹和赵伯骕	
二 李唐、萧照和刘松年	
三 马远和夏珪	
四 禅画山水	
五 其他画家	
第六节 辽、金的山水画	250
第四章 花鸟画	253
第一节 概述	255
第二节 五代的花鸟画	258
一 黄筌、黄居寀与西蜀花鸟画	
二 徐熙、徐崇嗣与江南花鸟画	
三 其他画家	
第三节 北宋前期的花鸟画	269
一 赵昌和易元吉	
二 其他画家	
第四节 北宋后期的花鸟画	285
一 崔白和吴元瑜	
二 赵佶与宣和体及宗室花鸟画	
三 文同、苏轼与墨戏花竹	
四 其他画家	
第五节 南宋的花鸟画	325
一 李安忠、李迪、林椿与院体花鸟	
二 扬无咎、赵孟坚与文人花竹	
三 禅画花鸟	
第六节 辽、金的花鸟画	343
第五章 书法	345
第一节 概述	347

第二节 五代的书法	351
一 杨凝式	
二 其他书家	
第三节 北宋前期的书法	357
一 宋代的刻帖问题	
二 蔡襄、欧阳修等其他书家	
第四节 宋人书风的典范	372
一 苏轼	
二 黄庭坚	
三 米芾	
四 其他书家	
第五节 南宋、金代的书法	391



导言



公元 907 年，唐王朝覆灭，中国历史进入到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南方和河东，则有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和北汉十个地方政权相继并存，史称“十国”。此外，在西北地区，还有契丹、回鹘、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西南则有段氏大理政权。五代十国，史学界简称“五代”。

公元 960 年，赵匡胤统一中原和江南。五代十国并归宋朝，史称“北宋”；但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和段氏大理等割据局面并未改变。嗣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崛起，建国号“金”，先后吞辽逼宋，入主中原；宋室被迫南渡，与金对峙，直到公元 1279 年为元所灭，史称“南宋”。北宋和南宋，历史上简称“两宋”。

本卷所要研究探讨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美术史事象。其中，绘画、书法列入上卷，建筑、雕塑、壁画、版画、工艺美术和美术著述则归在下卷论述。

第一节 五代、两宋美术风格的转换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五代、两宋历时 370 余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换时期。在此之前，自隋唐上溯魏晋、秦汉及三代，以士为表率的社会各阶层，所追求的主要是外在行动的人生价值。所谓“魏晋风度”或“神韵”诗派，不过是行动人生之外的一种变奏；由此反映在文化艺术上，也以辅佐政教王权或宗教神权的“成教化、助人伦”为重，作为经国致用的工具，呈现出雄深遒健或辉煌灿烂的作风，宏丽恣肆、庄严整肃、华贵雍容，浓于“壮美”的阳刚之气。从此之后，以士为表率的社会各阶层，所渴慕的主要是内涵静观的人生价值，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弘毅精神，不过是静观人生之外的一种变奏；由此反映在文化艺术上，也以畅神适意、欣赏愉悦为重，作为抒情写意的“余”事，呈现出文静典雅或平淡天真的作风，蕴藉恬淡、闲逸清隽、萧散婉约，浓于“优美”的阴柔情韵。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曾论“古今优劣”：

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如何？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

这是就题材分科的消长论绘画的转换变化，而所反映的，实质上依然是人生价值和美学倾向的转换。因为道释、人物画更适合于行动和壮美的表现，而山水、花鸟画更适合于静观和优美的表现的缘故。事实上，就“近不及古”的人物画本身而论，五代、两宋的作品在取材和技法诸方面的变异，同样反映了这种转换的特点，如风俗题材的兴起，白描水墨形式的出现等等。只要不是局限于行动的立场和壮美标准，它所取得的成就，未必就是“近不及古”的。

同样的古今之异，在绘画之外的其他美术门类，亦有所反映。如唐代之前的书法，多用于纪功或祭祀的碑版，以篆隶和楷书最为世所重，法度端严、气魄深厚；而五代、两宋的书法，则多用于自作诗文的书写，以行书和草书最为流行，潇洒俊丽，意兴风发。唐代之前的建筑，无论城市布局还是宫殿庙宇，等级森严，力重雄健；而五代、两宋的建筑，则以临街的店铺和公私的园林最具时代特点，熙攘辐辏，疏简清隽。唐代之前的雕塑，多崇高宏伟，巨大的物质体量，足以压倒观者的心灵；而五代、两宋的雕塑，则鸿篇巨制明显减少，世俗的造型急剧增多，尤其是小型玩赏性雕塑的兴起，朴素生动，千姿百态，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唐代之前的壁画，辉煌灿烂、魄力非凡，一直是传统绘画的主要形式；而五代、两宋的壁画则急剧衰退，一蹶不振，代之而起的是纸绢卷轴，成为嗣后传统绘画的主要形式，迄今还被作为“中国画”的狭义指称。唐代之前的工艺美术，无论陶瓷器、染织品还是金银器，均以实用为主，造型大度、装饰雍容、作风华丽；而五代、两宋的工艺美术，则更加注重审美，甚至出现了实用与欣赏相分离的现象，造型典雅、装饰精致、作风文静。至于在美术著述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差异，从艺术的功能到鉴赏的标准，从历史的评价到现实的导向，五代、两宋与唐代相比，分野更加明显。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许多美学观点，成为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被作为今天中西文化比较的基本依据。

虽然，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因五代、两宋确立的人生价值和美学价值观，在嗣后的元、明、清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五代、两宋，

正如西方文化造极于古希腊，后世虽各有创造性的贡献，但终究难以相颉颃。这也正说明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生产进步的不平衡性。

然而，尽管如此，文化艺术的发展，毕竟又是受社会生产状况的制约的。五代、两宋文化艺术的转捩，同样也是如此。

五代、两宋时期文化艺术风格的转捩，严格地说两宋的贡献为大，五代不过是起到了由唐而宋的过渡作用。至于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完全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讨论这一转捩的社会背景，重点是在宋代。

唐朝晚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的一系列事变，沉重打击了中央政权，各少数民族相机进入中原，在重重矛盾的恶性循环中，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终于分崩离析。这是一场浩劫，也是一次机遇，它使旧秩序无法容纳的各种社会力量和矛盾冲突的诸方面在较量中得以重新平衡、调整和组合、建构，以形成新的环境和格局。

五代时期，中原动荡，民不聊生，但长江流域的西蜀和南唐相对稳定，加上自然地理、气候的优越条件，生产力得以继续发展；两国的君主又都雅好文艺，着力提倡，所以文化艺术的发展也相当活跃。后来宋有天下，两地依然是社会生产和文化艺术的渊藪，尤其是北宋前期的画家，主要来自西蜀和南唐。

宋王朝建立之后，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从一开始就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终宋之世，成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这一政策，虽与西蜀、南唐的制度颇为相似，但由于它着眼于全国性的长治久安，因此，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深远，决非西蜀、南唐所能同日而语。

在传统史学家的心目中，“文治”、“武功”是两把基本的标尺，常被用来衡量某一朝代、某一帝王的历史成就乃至整个社会的心理特征。如果说唐代以前的历史成就以武功彪炳于史册，那么，宋代正是有名的文治盛世。所谓“文治盛世”，是指宋人崇尚典章制度，注重君臣礼仪，倡导文化事业，讲求心性修养等社会风尚而言，更是指宋代科举隆昌，以文取士，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文官官僚政治体系而言。

文治的关键性环节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并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宋代的创举在于取消了前代对参加科举考试者的各种出身限制和进士及第后的再次审查，进士及第即授予官职，无须权贵的举荐。唐“韩文公三试于礼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①唐代科举录取进士，每科不过数十人；而宋太祖即位之初，一次录用进士达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全部授予官职，待遇之优礼为历朝所未有。当时有大臣进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上意欲兴文抑武，弗听”。并明确表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②“兴文抑武”的国策使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京师的太学、国子学、小学之外，又陆续设立了医学、武学、律学、书学、画学、算学等。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后，各州、县也都设立学校。到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官学生员达二十余万人。^③与官学并行的是乡党之学，其核心是各地的书院，宋初

①《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

③《太平治绩统类》卷十八“祖宗科举取人”。

有白鹿洞、岳麓、应天、石鼓四大书院。南宋以后，仅临安城内，除各种官学之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第一里行、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④而远离都城的市镇，也出现了“镇学列三千余名学士”的盛况。^⑤

崇文抑武、优礼士夫文人的国策，其效应超出政治之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虽然，有些史学家以文治暗含贬讽，揶揄宋朝积弱不振，武备松弛——北敝于辽，西困于夏，既迫于金，又亡于元。但由于文治的推广，对于北宋，毕竟造成了“百年无事”、休养生息的安定局面；对于南宋，也使得长期苟安江南成为可能。这种安定而“不识干戈”的政治局面，无论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还是文化艺术的进步，都是有利的积极因素。

文献资料表明，北宋的人口，无论增长的绝对数字、增长速度还是增长率，都远远超过号称盛世的汉、唐。到北宋后期，全国人口总数超过了一亿。南宋虽仅有半壁江山，人口亦达六千余万，如果加上金的人口，总数约与北宋后期相近。两宋疆域仄逼，但垦田数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达七亿至七亿五千万亩，超过汉、唐时的最高垦田面积。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大幅度增长，在两浙路，亩产量约为三至五石，有的地方达六至七石，合今六七百斤，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唐代提高二三倍。^⑥

在农业生产成果的基础上，工矿、手工业、科学技术也得到大规模发展，“四大发明”最终完成并得到广泛的运用，冶金工艺和产量迅速提高，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铁产量在七万五千至十五万吨之间，铁制农具因此得到改进，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的进步。与此同时，采煤、染织、造船、航海、陶瓷、造纸、制墨、印刷等新的手工业也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仅染织业一行，不计国内朝野所用，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屡次和议，每次都有贡绢帛数十万至百万匹的条款，可见生产规模之大。

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尤其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成为宋代社会经济中富于充沛活力的中枢命脉。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州府仅十余数，北宋元丰年间为四十余，到崇宁年间发展到五十多，城市人口激增，以至于政府把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封建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唐代实行坊市制，居民区和商业区的界线不容逾越；经五代到北宋，坊市界线逐渐消失，新的厢坊制度则开始确立起来，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处经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汴京市民的游乐、饮食、杂货、伎馆、手工艺等各有集中经营的街巷，“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则形象地描绘了汴城内外街巷遍布店铺的繁荣景象，临街多为二层或三层酒楼、茶肆，店铺后面有市民的住宅。这种与近代城市面貌相同的城市布局，代替了唐代以前的古代城市，活跃着新的经济命脉的节拍。与此同时，各种草市、镇市作为新市区，星罗棋布于大城市外周围的广大地区，呈现出一派商贾辐辏的繁华景象。在乡村，则有店市、坊市、村市、山市、桥市、柳市等按商业种类自然形成的贸易形式，加强了农村同城市的联系。许多生产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卷入到商品交换的网络之中。传统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形式，由此而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的同时，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文化北渐这一历史性的变迁，

④《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⑤《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引《青龙赋》。

⑥ 参考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

也给这一时期的文化转捩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晚唐、五代，中原兵燹连年；南方各地则相对安定，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到北宋时，东南六路以雄厚的财富有力地支持了宋朝的统治。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以东南者为多。”文化方面，更是人才辈出。“国初每岁取士极少……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⑦“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⑧当然，南方士大夫在政治、文化活动中渐居支配地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人作相’”。^⑨这一方面是因为赵宋起自中原，拓疆定国，自北而南；另一方面也因为宋初南方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经过真宗、仁宗两朝，南方士夫集团与北方士夫集团的复杂斗争以及南方文人在科举考试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智，到北宋中期，南方势力才占据上风，这显然反映了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方的倾斜。宋室南渡，中原不但失去了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也不再是经济的重心区域，这样，从六朝开始的经济、文化南移过程，经隋唐的反复，至此遂告完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唐代以前的社会关系，以建立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豪强庄园制为特征。隋唐两代，世族虽渐次衰落，如刘禹锡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其影响和势力依然残存，在政治、经济、婚姻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顽强的表现，“创业君主，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⑩“民间修婚姻，不计品官而上阀阅”；^⑪在经济上，庄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政治上，代表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与代表门阀世族的贵族地主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始终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由于这种情况，唐太宗时修氏族志，武则天时修姓氏录，都是想用品官高低的等级制度，以确定庶族地主的法律位份，代替门阀的统治。但这种品官地主的社会身份，直到经过“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唐末社会大动乱和北宋消灭藩镇割据的干扰之后，才正式得以确立；与此同时，庄园农奴制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封建租佃制，佃农正式登上国家户籍，而脱离了作为门阀私属的卑贱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人身自由。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含有明显区别于贵族社会的庶族化色彩，皇帝不再是少数门阀世族的意志代表，而是成为全国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政权核心，代表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文彦博曾向宋神宗慷慨陈词，说皇帝应该“为与士大夫共天下”。^⑫这种论调，在唐代之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宋史》所载狄青轶事亦是一个有力的例证：“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仁宗）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青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⑬说明了观念上的极大变化。

门阀观念的淡化，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举取士，婚配择偶，都有了新的标准，与唐代的“男女婚嫁，不杂他姓”，选择后妃尤注重“妙择天下令族”不同。宋代“士庶婚姻，浸

⑦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三。

⑧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⑨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

⑩ 《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

⑪ 《新唐书》卷一七二“杜中立传”。

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

⑬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

成风俗”，即使后妃，也“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倒是“小官门户”。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进士三百三十名，其中宗室之后仅二十五人；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中榜者六百零一人，平民出身者达四百一十七人。“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⑭在宋代蔚为风气。那种依靠血亲门第来维系其特权的贵族势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崇文抑武的政策，科举制度的实施和门阀制度的废除，极大地解放了文人士夫的文化创造力。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得文房用具的制度日趋精良，为文化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于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创造出登峰造极的辉煌成就，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如哲学方面的程朱理学；史学方面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文学方面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词可与唐诗相辉映，而宋诗，也自有唐诗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色。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六《跋写真刘敏叔八君子图》有云：“一代一两人，国已九鼎重；如何八君子，一日集吾宋。”所谓“八君子”，是指北宋的赵普、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他们是当时士夫的典范、文人的楷模。至于艺术，更是“郁郁乎文哉”，无论绘画、书法，还是建筑、工艺，都给人以观止之感。

^⑭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